

Ethnoarchaeology in A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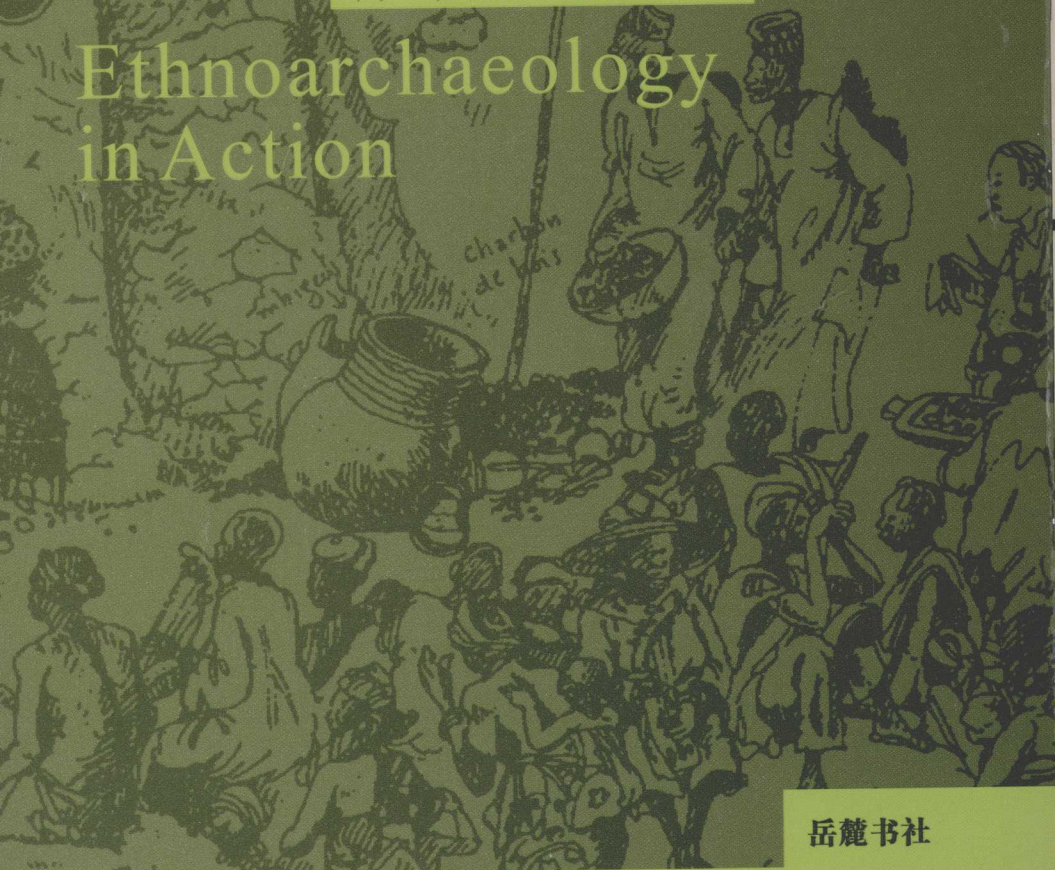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译丛 周大鸣◆主编

民族考古学实践

尼古拉斯·戴维·
卡罗·克拉莫 著

郭立新等·译
姚崇新

Ethnoarchaeology in Action



岳麓书社

Ethnoarchaeology in Action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译丛 周大鸣◆主编

民族考古学实践

尼古拉斯·戴维·著
卡罗·克拉莫

郭立新等·译
姚崇新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考古学实践/(美)戴维等著;郭立新等译. —长沙:

岳麓书社,2009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译丛)

ISBN 978-7-80761-237-7

I. 民... II. ①戴... ②郭... III. 民族考古学 IV. K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6295 号

Translated from *Ethnoarchaeology in Action* by Nicholas David and
Carol Kram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民族考古学实践

作 者:尼古拉斯·戴维 卡罗·克拉莫

译 者:郭立新 姚崇新等

责任编辑:邓 翊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7.75

字数:460 千字

ISBN 978-7-80761-237-7/K·272

定价:45.00 元

承印: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前言

1997年初,我们决定开始编写那本我们数年前谈论过的关于民族考古学的书。我们都天真地认为,这和将我们的课程笔记凑在一起,并填充一些表格而已。但我们的经历却与原来的设想大相径庭。我们并未打算给初学者写一本教材,而是希望能够对这个已诞生了大约45年的人类学分支学科进行重估。为此我们将自己对这个主题的理解表达出来,并通过进一步的阅读来延伸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极大地受益于《民族考古学及相关研究目录》(David et al.1999),这本书是由尼古拉斯·戴维花费数年时间编辑而成的。尽管如此,任务的庞杂性导致我们做全面整理工作不可避免的失败,并逐渐累加,以至到写作时,我们初步分出883个民族考古学门类。我们并不希望把它做成一个目录,一个校对版,或者一个大百科,而是希望在这世纪更替之际经由对个案研究的批判性解读,引导读者对民族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质问题有明智的了解。结论尚有待作出。

首先,使用一个民族考古学的严格定义,这涉及民族志田野工作中对物质文化和文化整体之间关系的阐释。其次,需要寻找并使用大量已出版的材料,这一工作需要对这些论文作细致的考察,因为这对许多读者来说并不容易。第三,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讨论更多的作者,尽管这意味着把一些重要的作品放到“进一步阅读”栏

内,甚至整个地忽略它们。我们意识到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对于那些非英语出版的作品,我们的评论远非全面公正。第四,与第三点有部分矛盾的是我们并不羞于讨论我们自己的研究,这些研究远早于我们对该课题的关注。

最后说一下我们的情况:我们都是民族考古学的实践者,主要在旧大陆有着丰富的考古学和民族考古学经历。卡罗·克拉莫主要在亚洲西南部和印度,尼古拉斯·戴维主要在欧洲和非洲。我们两个作过从村落到地区,从城市到腹地的调查。从理论上讲,卡罗·克拉莫倾向于用“自然主义”方法,而尼古拉斯·戴维倾向于用“非自然主义”方法,但我们都不是理论家。因此我们的观点同时包含了新考古学的“过程主义”和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后过程主义”。我们对待理论的原则是即使不综合,也至少可共存。



译序

考古材料固有的局限性使考古学认识论基本上建立在推论的基础上,而推论又天然地依赖今人的常识、民族志记录和历史文献,综合运用这些知识来解答考古学疑问的做法,可以一直追溯到考古学诞生之初。

考古学研究的起点是古人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总称为“遗存”),而不是人类活动本身。因此,如何透过这些严重残缺的、静态的考古遗存来复原动态的古代历史画卷以及古人生活与行为方式,是考古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构成考古学理论关怀的基本出发点。考古学家解读古代遗存的基本依据来自三个方面:考古学家自身习得的人类常识、历史文献记载和民族志记录。

常识对考古学的作用虽很少有人从学理上进行讨论,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无处不在,小到考古器物的命名、遗存功能与性质的判断、地层或遗迹现象的认定等,大到考古学文化的认定、对于文化发展和文明起源等重大问题的思考等。将常识应用于考古学推断的哲学基础是古今人类在智性上的一致性。这一基础是考古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基本预设前提之一。离开了这一基础,任何考古学研究都无从谈起。常识对于考古学推断的局限性有两个方面,一是常识仅代表极小时空坐标内的有限知识,相对整个人类发展时空和社会文化多样性而言,它只代表人类经验中的极小一部分;

其二,常识大多以自我和己群为中心,难免带有自我中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色彩,在不加反思和批评的情况下,很容易将推论带人歧途。

将历史文献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亦为中国考古学的一大传统。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历史文献的丰富性使这种结合对于历史考古研究和上古、中古历史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所以,自王国维提出将地下出土材料和历史文献结合起来的“二重证据法”以后,这种方法已成为国内历史学界和历史考古研究和论证的基本方法。

由于考古学家需要处理的是数以百万年计的人类历史文化遗存,无论时间、空间或文化面貌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进行考古学推断和复原所需要的依据和知识,远远超出了常识和文献所能涵盖的范围,如全部史前时代、大部分原史时期遗存。这时,考古学必须求助于社会—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张光直先生指出:

文化人类学(或称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习俗与社会制度,具备所有种类的蓝图,这些习俗与制度,在考古遗址里面,只有一点物质痕迹残留。不熟知文化人类学的考古工作者,很自然地将这些遗物只当做物质文化处理。熟知各种习俗制度蓝图的考古工作者,便有可能根据残存的部分将全部习俗或制度复原。^[1]

所以,在考古学研究中,引入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和理论,是非常必要的。中山大学人类系自复办以来,一直秉持文化人类学四大分支的学科建设传统,将民族考古学作为主要的学术发展方向之一。是故“考古学译丛”在选编时,将本书纳入到出版计划中,冀以让国内读者对西方民族考古学发展历程和学科实践有一个概览式的了解。

本书作者尼古拉斯·戴维(Nicholas David)和卡罗·克拉莫

(Carol Krammer)均为西方民族考古学的奠基人和主要推动者。他们生平传记如下:

尼古拉斯·戴维 1937 年出生于英国,1960 年获剑桥大学学士学位,1966 年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其主要研究兴趣是民族考古学、考古学理论、非洲史前史晚期和文化史、欧洲旧石器晚期研究。自 1984 年起主持在尼日利亚、喀麦隆和加纳等国开展的曼德拉考古计划,还在苏丹南部和中非共和国开展工作。在 1980 年进入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任教授之前的四年,担任过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考古系主任。1980—1985 年创建并编辑《非洲考古评论》。2001 年退休后主要在喀麦隆北部从事田野工作。

卡罗·克拉莫(1943—2002)出生于美国纽约,1964 年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她虽在艺术与法语方面有过人天赋,但决定从事考古学,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研究生,1971 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在读研究生期间形成的对建筑与空间组织的兴趣影响了她一生的事业。1970 年夏天在危地马拉发掘,并与一位城市陶工一起工作,为以后她对印度陶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学习期间,她参加了伊朗数个考古遗址的发掘,这里也是她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地区之一。毕业后,克拉莫先后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莱曼学院和研究生院)和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任教,主要在伊朗和印度从事聚落、制陶民族考古学调查与研究,此前国内学者对其作品已有过介绍。^[2]

本书翻译分工如下:前言、致谢、第一、二章和第四至六章由郭立新翻译,第八章至十三章由姚崇新翻译,第三章、第十四章由孙慧翻译,第七章由王苏琦翻译。郭立新对全文进行校译。钮小雪和胡琰梅协助编辑了部分初译文稿,李珩、程小锋和朱明敏协助录入参考文献。译者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诚望不吝指教。

注释:

[1]张光直《建议文物考古工作者熟读民族学》,《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31日。

[2]参见郭凡《探索人类行为与考古遗存之间的联系——对克拉莫所编〈民族考古学〉一书之评述》,《南方文物》1989年第1期。



出版说明

近代意义的中国考古学的生成虽然是十九世纪末西学东渐的泽被所至,但在其不足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长期以来与西方学术主流相互隔绝。最近二十年间,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翻译和评介渐成风尚,其中不少译作影响了许多考古学者。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推出的《西方考古学译丛》首辑计有五种,无论在出版品种规模上,还是所选原著与当前西方理论潮流的关联程度上,都是无前例可循的。

西方考古学的翻译,如其他西方学术翻译一样,既忌讳但凭译者见识高下及个人好恶以偏概全地引介,也担心辗转多途的引进原著仅具有学术史意义,而与当前学术潮流无涉。基于这种考虑,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多方联络至今仍然活跃在研究前沿的西方同行,请求予以推介最能代表近二十年来西方考古学理论发展趋势的著述。在此基础之上,他们甄选了五种著述,编辑为《西方考古学译丛》的首辑:崔格尔《考古学思想史》是自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以来最优秀的考古学史著作,并且首开思想史视野下考古学活动的观察门径。戴维德和克拉梅尔的《民族考古学实践》是民族考古学尝试作为新的学科分支的正名之作。达柯《理论考古学》和约翰逊《考古学理论导论》一直被欧美大学的考古学导论课程当成选用教材。霍德和哈特森的《阅读过去》则奠定了西方考古学中作

为诠释学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基础。以上五种原著在国外曾多次再版重印,均属言及西方考古学理论不可避免的重要作品。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力求保持原著的行文风格和写作习惯,我们对此深表赞同,并在编辑过程中予以尊重。但出于译丛构成的考虑,我们谨慎地调整了部分体例,以求统一。文中加注和索引格式均遵循原著风格,原著的参考文献目录也完整地附于书后,未作任何改动,便于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查找相关文献。原文的插图(尤其是转引自更早期的著述的插图)也尽量保持原貌,而未作重绘;尤其是图文合一的插图均依原样保留,而未强行分割翻译。

作为一个蜚声海外的古籍出版社,多年来岳麓书社一直是古代经典学术著作出版的重镇。在学科研究日益多元化、边缘化的今天,泥古不化、闭门造车显然都不是我们应有的学术姿态。抢占新世纪学术研究的制高点,把握世界学术前沿的脉动,以利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的使命。《西方考古学译丛》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所做的尝试之一。不当之处,还请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岳麓书社的新老朋友不吝赐教。



致 谢

有很多人机构和为这一工作作出贡献。我们对那些阅读和评论不同章节的同事和朋友一并表示感谢。我们受益于温迪·阿什莫、凯思·卡麦龙、沃伦·迪波尔、T.J.富格森、卡思·富思特、奥利佛·高瑟列、纳塔里·坎姆本、简·克里、戴维·克里克、巴巴拉·米尔斯、格里·奥特拉、皮埃尔·佩特里昆、安妮·斯塔尔、莫莉和雷·汤普森、坡利·卫斯勒等人的建议,以及我们的几个学生,特别是查尔斯·玛瑟和金·琼斯,并得到出版评论人卡拉·新诺波里和帕蒂Jo.沃森深富洞见的建议。我们同样感谢那些把简历提供给我们的杰出同行,遗憾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把那些主要的民族考古学家的简要传记收录进来。很多同行把他们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和其他实践活动提供给我们,图片说明中可以辨认出他们来,我们要感谢他们愿意翻寻旧的档案和卷宗,找出很久以前探险的细节。他们的努力使本书更有意义。加尔文大学考古系格里·纽兰兹把幻灯片、印刷品和文件转换成插图的行为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由于民族考古学家的工作档案从来没有优先权,也很少使用,需要特别感谢他把模糊发黄的幻灯片和其他媒体材料转换成在最低限度上可以出版的东西。地理系的罗宾·波伊特拉斯提供了两幅精致的世界地图。我们还想感谢克拉瑞·阿鲁姆、南茜·迪沃尔、安思罗-佛图、艾尔文·迪沃尔、卡罗·吉福德、乔治·古尔曼、

福兰克·霍尔、凯茜·休本斯什米德特、C.米沃尔·迈克列德、彼特·阿玛·安玛什妮、玛特·斯托尔佩、比尔·萨姆勒和帕蒂·Jo.沃森帮助我们获得照片,以及安妮克·乔福罗协助翻译。我们特别感谢克里斯蒂安·塞妮诺波斯允许我们使用他在喀麦隆北部玛万斯尔(Mawasl)绘制的熔铁场景的生动素描作为封面。

尼古拉斯·戴维感谢美国科学基金会和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协会多年的大力资助,使他成为一本民族考古学书籍的合作者。1999年上半年,卡尔加里大学给了他一个学术假期,以及卡尔加里人文研究所从1999年9月起提供一年的研究基金。两者都提供了宝贵的写作时间,并得到后者继任领导人简·克里和罗斯玛利·奥曼,以及同伴们的激励。尼古拉斯·戴维同样感谢喀麦隆、尼日利亚和加纳政府有关部门允许他和他的学生到其国家工作,特别是墨罕玛都·埃尔瑞齐及已不存在的喀麦隆人文研究所,以及L.I.伊祖阿阔,穆萨·汉姆布鲁和尼日利亚国家博物馆与纪念物委员会。尼古拉斯·戴维特别感谢喀麦隆北部富尔贝、玛法和摩克罗等其他地区,以及横跨尼日利亚边境的苏库尔及附近地区的人民,在那里他作为民族考古学家工作了32年。他要把特别的赞美词献给他的助手们:苏艾布·巴金度,伊萨·艾曼缪尔·卡沃尔德、约翰·哈布嘎、菲利普·艾玛缪尔·苏库尔、玛库斯·埃兹拉·姆卡玛、伊斯嘎·达里·苏库尔,他们为这项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后,他感谢他的妻子、同事朱蒂·斯德纳,以此合作之书题献给她。

卡罗·克拉莫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史密松学院国外通用项目、纽约城市大学研究基金会、亚利桑那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所,因为它们为她在伊朗和印度的研究以及随后的数据分析提供了支持。她感谢伊朗和印度政府的代表为她提供了研究许可。在印度,柯玛尔·柯萨瑞、佛耶·维玛,尤其是她的助手曼诺哈·拉拉斯,为她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目 录

译序	一
前言	一
致谢	一
第一章 民族考古学:性质、起源与历史	一
第二章 民族考古学理论与类比	三四
第三章 田野工作与伦理	六七
第四章 人类的残留遗存:进入考古学语境	九八
第五章 动物群与生计	一二四
第六章 人工制品研究:功能、制作与分类	一四六
第七章 风格和边界标记:区域比较研究	一七八
第八章 聚落:系统与模型	二三五
第九章 遗址结构与活动	二六八
第十章 建筑	三〇〇
第十一章 专门化的手工生产与学徒	三二三
第十二章 贸易与交换	三八六
第十三章 丧葬习俗、身份、意识形态与思想体系	四〇七
第十四章 结论:情境中的民族考古学	四四三
参考文献	四六〇

第一章

民族考古学：性质、起源与历史

考古学家的的问题似乎是,他们总是太晚了。

——蒂姆·恩格尔德:《技术的社会动力:实践、政治与世界观》,4页,1999年。

很明显,一次民族志调查即无可能也无必要面对每一个人。

——苏珊·库斯:《作为人类学家的考古学家》,209页,1997年。

我们从民族考古学为何以及如何出现开始谈起,并通过一个来自秘鲁的例子来说明它是什么。然后,在解释本书的写作计划后,我们对其进行定义并对其发展历史进行分期,最后简要说明一个民族考古学家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需要民族考古学?

考古学阐释建立并最终依赖于类比这种推论形式。如果一种东西在某些方面与别的东西相似,则此二者其他方面也很可能相似。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把一个燧石片认作人工制品,或建构起一长串推论,将它归因于早期文明的某种生产模式(Trigger 1993: 45~46)。考古学家在寻求对破碎遗存进行类比的可能性时,从他们读到的、听到的或看到的所有东西或所有生命中提取有用的信息。

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对于过去的注意力开始转向一个新的方面,开始理解超越文化编年与时空系统的人工制品组合的风格,把文化差异组织到一个临时而方便且空间有限的框架中,如时间和文化(Willey and Phillips 1958)。但当考古学家转而研究文化进化以及重建人类行为和过去的环境时,他们意识到以自己经验为基础的常识以及世界历史的和民族志的资料,不再能为类推论提供充实的基础。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所涉及的范围,对于类推那些生活在遥远时空背景中的人们来说太有限了;因为以往对他者的描述很少注意到他们的物质文化或强调其类型,然而那些提供有关过去社会文化行为线索的考古遗存又经常在时空上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民族志提供的考古学家所需要的信息的不足,很容易由卡尔·赫德(Heider 1961:62)建议的一种练习所证明:首先把“一个文献记载的活生生的文化简化为考古遗存”,然后让别人“从这些遗存中重建该文化”。这类试验,在实施分析者的假设时有用,但重建的图景经常与原来的情境不协调,几乎不可辨认。^[1]

正是认识到需要用于基本类比的民族志物质材料,出现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民族考古学,从考古学的视角对活生生的文化进行民族志研究。^[2]民族考古学既不是理论,也不是方法,而是一种研究策略,即同时在活生生的背景中和考古学记录中理解物质文化与文化整体之间的关系,并利用此类理解以丰富考古学概念,改进考古学解释。这是民族考古学诸多定义中的一种。一个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可能注意到相当不同的方面,而民族考古学作为人类学调查的一种形式,将物质文化与相关行为的证据置于优先位置。

一个来自秘鲁尤卡亚力河谷的例子

沃伦·迪波尔(图 1.1)1970 年在史皮坡以及附近的科尼坡(Conibo)开始他的民族考古学工作。这是唐纳德·拉斯兰普对亚马

逊河上游地区开展长期的文化史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两人合写的论文《史皮坡和科尼坡陶器的制作与破碎》(DeBoer and Lathrap 1979),主要涉及史皮坡和科尼坡人行为关系的性质,特别是与陶器有关的,以及在印第安人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可在考古记录中留存的代表。

在简要介绍史皮坡和科尼坡的情况,并告诉我们大部分妇女制作陶罐以及大部分陶器为家用陶器之后,迪波尔和拉斯兰普介绍了陶罐的类型及其印第安名称和用途。指明土著分类并伴之以分析表格,显示不同类别陶器的黏



图 1.1 图中显示的沃伦·迪波尔不在秘鲁尤卡亚力,而是与非裔厄瓜多尔助手在厄瓜多尔埃斯梅拉达地区进行田野考古,里约·圣地亚哥,1988年。

土、砂粒、形制属性、表面处理 and 大小特征等。作者接着指出制陶原料是如何获得的,黏土和砂料通常是本地的,但其他材料,特别是颜料,有时是从几百公里外获得的。获得这些材料不是通过特别的远征,而是在社交性访问与临时雇佣旅行过程中获得的。因此外来材料不一定是贵的。一种研磨碎末得自考古遗址,为此,“考古遗址的存在是决定聚落选址的因素之一”(第 111 页)。

陶器制作通常是在房子里或特殊的工棚里进行的一项个人事务,陶罐一般放在可能是一个专门制作的无底陶罐内就近烧造。除了成型、装饰和烧造外,我们还知道,尽管陶工们都同意不同类型容器的黏土和砂料之比是不同的,但实际上这种比例的变化范围很大,以至于一个考古学家绝对不可能根据从垃圾堆里找到的陶片来重建社区观念。另一方面,尽管在细节上有所不同,陶罐的表面处理与装饰显得非常标准化,因容器的形制变化而各有不同。